中山大學報

SUN YAT-SEN UNIVERSITY GAZETTE

(新)第 313 期
2014 年 6 月 9 日
本期四版

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主办
《中山大学报》编辑部出版
国内统一刊号 CN44-0815/(G)

本报创刊于1926年11月5日

http://202.116.64.86
E-mail:xiaobao@mail.sysu.edu.cn

校庆 90 周年巡礼·教授篇

脱俗求真的追随者



“谈到蔡先生的为人，我觉得他诚恳、淳朴，不善言辞，从不夸夸其谈，自己虽然学富五车，却从无骄矜之气，是一位‘恂恂如也’的老实人，是一位内向型的人，而我最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——季羡林

蔡鸿生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、中国海交史学会名誉会长，中山大学桐山基金杰出教师。

1957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，2006 年退休前为中山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。1990 年，获广东省普通高校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。1994 年，获广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。2002 年，专著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。2011 年，被授予首届“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”称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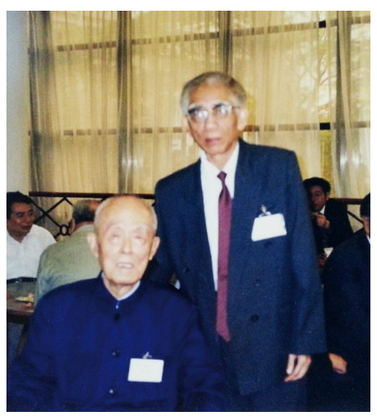
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，在古代罗马史、中国佛教史等领域颇有建树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，是知名的中外关系史学家。已出版有《俄罗斯馆纪事》、《尼姑潭》、《清初岭南佛门事略》、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、《学境》和《仰望陈寅恪》等论著。

■ 本报记者　彭建楠

对于学术圈外的人来说，知道蔡鸿生教授的名字，大抵是因为那本并非随意的随笔——《仰望陈寅恪》。蔡教授曾在陈寅恪先生门下受业一年，这段师生缘分结下了他学术生命的根蒂，却也是外人感兴趣的“新闻点”。很多媒体向蔡教授约采访，话题都离不开国学大师早年间的故事，末了还要蔡教授谈谈传统的术业在当代如何存续。尽管记者来了一拨又一拨，蔡教授说的大意都没差多少，因为人生与学问的道理，本就是那么几条，若读过蔡教授的《学境》，就知道他已然说得透彻，只是年复一年，大家且听且闻，不知不觉变成常谈罢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个冒失的造访者，但蔡教授还是乐意接待，他对年轻人的宽容，让我既感动又汗颜。本籍汕头市的他，用力避开乡音，一字一顿地说普通话，语调平静而温和。已故的季羡林先生曾摹画过蔡教授的神态：“谈到蔡先生的为人，我觉得他诚恳、淳朴，不善言辞，从不夸夸其谈，自己虽然学富五车，却从无骄矜之气，是一位‘恂恂如也’的老实人，是一位内向型的人，而我最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。”尽管访谈时间不算太长，我已然感受到那种“恂恂如也”的学人气质：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，仍有一种执着，不跟风，不弄潮，依然淡泊而坚韧。



2006 年 12 月，在『19 世纪中俄经济文化交流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总结发言



2000 年与季羡林先生合影

学缘　长忆金明馆

修习《元白诗证史》这门课时，蔡教授是三年级本科生，从 1955 年夏至 1956 年夏，恰好是一次春华秋实的循环复始。不过，蔡教授不敢说自己是金明馆的“入室弟子”，在《仰望陈寅恪》的自序里，他甚至说自己并无多少回忆，有的只是一些感念之情。及至介绍陈先生授课的款款风度，蔡教授也援引周一良等学界前辈的日记，却不愿再多提自己当日在讲席旁凝神聆听的情形，说是怕“狗尾续貂”。其实，蔡教授的心里怎会没有金明馆的刻痕？关于读书、关于做人，陈先生没有多少说教，却为学生作了榜样。那些问学的记忆，点滴之间，都浸润在了蔡教授的学术生命。

蔡教授还记得自己选修《元白诗证史》的原因：“素闻陈先生是大师，所以多少有些好奇，想去见识一下。”但好奇心很快被学识不够的焦虑代替了。陈先生以《元白诗证笺稿》作课本，附带印发《支愍度学说考》等 9 篇论文作参考资料，有主有辅，配备齐全。蔡教授是勤勉的人，尽管做足了预习，上陈先生的课还是有大兵压境之感，先生脱口而出的史地名物、典籍材料，他以为是常识，实则远远超出了本科生的眼界，只有下课后再仔细温习。陈先生信步于云端，学生们虽然只能仰望，但也不知不觉间感悟到学术的灵光。蔡教授是中外关系史专家，谈起自己的领域，他却首先忆起了金明馆。蔡教授说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来历，在学术界就是要讲学术渊源，而他的学缘正系在陈寅恪先生那里。陈寅恪先生对中西关系的考察主要在中古时期中国和印度、中亚的交流，如佛教的传入、唐代的胡姓胡名等，皆能牵一线而窥全局。蔡教授的代表作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，也是渊源有自。但他并不流连于中古，更沿着世代的推衍，去探索清代中国与西方的碰撞。蔡教授说，历史研究分成中国史和外国史，但两者并不是决然分开的，中外关系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座桥梁，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西关系。这个西字，在古代指中亚、印度，在近代就是指西洋。西方的潮流，譬如“西学东渐”对于中国有着怎样的影响等等，这些探讨都有其必要性。“中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，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割裂开来看问题。”

发覆　大师的境界

除了学术格局的树立得益师承，不知不觉间，蔡教授也濡染了老师的思辨气质。他那篇颇具影响力的“少作”——《突厥法初探》，最初的酝酿就源自《元白诗证史》课后的思考。“陈先生讲中古史，能从传世的常见的文献中，看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。这个就是发覆。这不是轻易能达到的境界，但要朝着他的方向努力。我的《突厥法初探》是一个小例子。古代游牧民族流动性很大，发展水平达不到农耕文明，但他们毕竟是构成了社会，如此必定有其法律。在当时留心这个问题的人不多，我觉得还有探讨的余地。”《突厥法初探》所依据的材料也都是为学界所熟知的文献、文物，但思路和结论却是别开生面，虽然这个论题在本科时期已着手，但撰文的过程却持续了好几年，《突厥法初探》在 1965 年时发表于《历史研究》，此时他已经是历史系的年轻助教了。蔡教授说，做学问老老实实，不能急功近利，写完的文章还只是一个胚胎，即使有新意也还不完善，所以必须冷处理，搁一搁继续修改，陈寅恪先生的三部重要著作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、《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》、《元白诗证笺稿》都是以“稿”称之的，他当年授课时告诉学生，这些“书稿”他还要继续补订，大师尚且如此，后辈更要谨慎。千万不可将“半成品”充成品，将“成品”充精品！

心曲　脱俗求真，甘于寂寞

80 年代后，“陈寅恪热”逐步升温，大师身后陡然多了无数追捧者。不过蔡教授显得极审慎，他认为，大众眼中陈先生的光辉，多是因其人格的魅力，而不是学术的魅力。“我们讲陈先生会说起独立自由，但陈先生是一个学人，他的学术魅力是发覆，是脱俗求真。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。”所谓脱俗求真，源自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：“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”对真理的追求，也成了蔡教授毕生的心曲。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，蔡教授开始关注清代中俄关系，并着手研究背景“俄罗斯馆”的历史。蔡教授发现，作为一个代行使馆职能的联络机构，“俄罗斯馆”培养了一批俄国的中国通，其中有些是传教士，有些是爱好中国文化的留学生，他们还把许多中国的典籍带回了俄国。因此，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并非起源于圣彼得堡大学等高等学府，它的源头反而要追溯至北京。《俄罗斯馆纪事》这部著作的初稿在 74、75 年就已有雏形，可直到 90 年代才得以出版。回想起来，蔡教授倒是云淡风轻：“如果我跟着潮流走去研究侵华史，那很快就能出书了，但我必须尊重历史事实，清代俄中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侵略和反抗，还有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。我尽量避免以偏盖全，不敢放言高论，这就足够了。”

脱俗求真这一条，蔡教授不仅贯穿于自身的治学，对待当下的“陈寅恪热”，他也冷静地做过反思。譬如陈寅恪先生提出的“预流”说，素为人津津乐道。但蔡教授还是要加以辨析：“预流不是要赶时髦，毕竟新的材料、新的出土文物的发现不是经常之事，有些人误解加误导，以为预流就是要追赶潮流，于是就走了歪路。”蔡教授始终认为，陈寅恪先生治学的最大特色是发覆，就是要把大量看似寻常的传世文献读透，“从史中求史识”，这才是大师的境界。

眼界　以通识的眼光作专题的研究

蔡教授常常告诫后学不要把书读偏，我进一步求教，才明白他是有感而发。近代学科分工愈趋细致，就历史学而言，本应是打通中外古今，但在当今的学科体系下，首先就人为地定出中国史和外国史的界域，中国史之下，又有断代史，断代史之下，又有经济史、政治史等专门研究，就好像显微镜下的切片，失却了学问的厚度。“学者长时间地投入一个专题，会日久生情，这并不是什么坏事，但情到浓处，也容易画地为牢，死守这一方区域。这样做研究反而受到知识面窄狭的局限，不能深入展开。”蔡教授说。

跟蔡教授聊天，话题似乎总能绕回陈寅恪。谈到通与专的兼取，蔡教授直截了当地引述陈先生的意见：“陈先生早已说过，国人治学罕具通识，但现在的人又多是作专题研究，如果要取得平衡，就要用通识的眼光来探讨专门的问题。这话说起来简单，运作起来是需要非常高明的学力的，但我们在研究中至少应有融会贯通的意识。”或许大师的润泽就这样和光同尘，又无处不显其形。而蔡教授也并不仅是呼吁而已，他也一直在鞭策自己去接近这种“高明”，在一次新生入学讲话中，他鼓励大家做学问要从难从严：“就是要为自己立一个高标准，往高处、往深处发展，这样就会怀有强烈的希望，不会满足于低状态。”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。蔡教授所从事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，本就需要一种通识的眼光，“既然讨论中外关系，就不能只驻立一头，譬如我研究广州与海外的通商交流，本土有文献记载，阿拉伯、东南亚地区也有文献记载，两头都要看，如果是独眼观世界，一定会影响结论。”

潜研　理想精神的激发

蔡教授经常提到清代学者钱大昕的“潜研堂”，潜研二字，他特别受用。潜下去读书，也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，蔡教授 1957 年本科毕业时赶上反右，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，遑论硕士、博士，紧接着又赶上无休无止的“运动”，既有政治学习，还要下乡去干农活，有时一去就是一年半载。可蔡教授没有多少抱怨，他说，那时做学问，最缺的就是时间，可既然别无他途，就只能见缝插针，“劳动放假回来一个星期，我就抓紧这一个星期找书读书。”在动荡的年月里，蔡教授连个学术上的名头都没有，却尽可能地做一个认真的读书人，我以为，支撑他的是对学问的纯粹笃好。但蔡教授告诉我，他其实是感受到了理想精神的激发。

“人的精神世界很复杂，能够激发心灵的力量源于多重的因素，或为小我，或为大我。前辈学人处身忧患之中，仍念念不忘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。已故的陈垣教授说，每每看到日本人新出的汉学著作，都觉得是一枚炮弹打在桌面上，觉得是中国人的耻辱。这就是一种责任感，使命感。放在心头很沉重，但是能不断激发人向前。”蔡教授说。对于年青一代的学者，蔡教授也希望他们能找到这种激发感，“不是名利上的激发，比如职称、项目、资金等，这些或许有一时的作用，但不能长久，年轻人应该有充满理想色彩的，并为之奋斗终生的追求。按现在的说法，就是实现一个人的中国梦。”同时，潜下去还意味着不能急着浮起来，换言之，就是不能急功近利。现在动辄讲填补学术空白，对这种自我表彰，蔡教授不以为然：“填补空白对人的要求很高，意味着在前人没有涉猎的领域有发明，那又如何知道是空白呢，必须要摸清学术史的整体，不仅是前人的，今人的，还有洋人的，所以要实事求是，不要把填补空白变成一句顺口溜。”

寄语　持之以恒，做出成绩

今年是中大建校 90 周年。蔡教授自 1953 年进入中大历史系读书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至今已逾六十载，可以说，校史的三分之二，都有他的见证。回想起中大历史系的薪火传承，蔡教授虽然也感到欣慰，但用词仍带着史学家的严谨：“做学问的高下很难定位，我只能谈谈对于中大历史系的一点印象。”蔡教授戏称历史系是小系，“比起中文系，学生的人数要少太多了”，可却“好比一只老母鸡”，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法学等学科都是从这里分化出来的，对于中大现在的学科设置，有其历史贡献。至于学人的新旧更迭，蔡教授的看法也颇为达观：“历史系曾经有大师，像陈寅恪先生、岑仲勉先生，他们都留下了卓越的学术成果，而新一辈的人也在探索新的方向，像是近代中国研究，历史人类学等，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也十分出色。”不过，不论是创新的领域还是传统的路子，蔡教授都希望青年学子能持之以恒，练出定力，养出静气，做出成绩。他还特别寄语学术新秀：要自觉抑制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亢奋心态，防止在顺境中走下坡路。

（下转第 1 版）

编　论

谦谦君子　儒雅学者

梦森

采访年逾八旬的蔡鸿生教授，给我的初次印象轮廓分明：其貌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；其言谦和简练，意味深长；其识满腹文章，宁静致远。再访几回，耳闻目睹，领悟其心声，拜读其著述，加以旁人佐证，直至稿子反复修改，尘埃落定，蔡老在我心目中的形象，已超越初次见面，犹如康乐园中布满年轮的一棵参天大树矗立面前，让我仰望之，神往之。

就像中大老教授这个群体一样，蔡老身上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学生和年轻老师学习发扬的地方，敝人认识或会挂一漏万，只能基于我心中最想说的两处，尝试表达敝人的感念。

一是谦逊。其一，做人低调，是蔡老给我最深刻最突出的印象。在几次求访蔡老的过程中，实际上他也在很多场合，经常以“夹着尾巴做人”的话来告诫自己或表述心声。读本科时，蔡鸿生选修了陈寅恪教授开设的课程《元白诗证史》，虽受业一年，但他不敢说自己是金明馆的“入室弟子”，也从不标榜自己是陈寅恪的学生，显耀门风，反观当下的大学中人受“傍大款”、“傍名人”的社会风气影响，不乏有人炫耀“我导师是某校长”、“我导师是某院士”、“我老师是某学科带头人”、“我老师是某大牌教授”，给脸上贴金，以提高身价。另一方面，蔡老悄然潜入恩师陈寅恪的灵魂深处，撰写了《仰望陈寅恪》一书，被评价为“是祭奠陈氏的一瓣馨香，也是解读陈氏、理解陈氏的一段心史”，“掩卷之余，犹如享受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”。**其二，学风严谨，是蔡老的谦逊人格渗透在他的学术品格中。**他常常挂在嘴上的话有：“做学问老老实实，不能急功近利”，“潜下去不能急着浮起来”，“不赶时髦，要冷处理”，“不要动辄就称填补学术空白，这方面要慎之又慎”。他一贯是这样强调的，也是坚持这样做的，比如 1965 年，32 岁的他发表于《历史研究》的论文《突厥法初探》，其史料准备和文章构思却在他读本科时期，文稿用了好几年写成，又搁置一段时间再修改完善，期间将近十年；又比如他出版于 90 年代的代表作《俄罗斯馆纪事》，酝酿于 70 年代初，而那时研究清代中俄关系热衷于俄国侵华史，但他却专注于当时同样客观存在的中俄文化和贸易交往，假如他不这样，而是跟着时尚走，那此书的问世至少要早十多年。**其三，尽管学识渊博，蔡老依然保持谦虚恭谨的态度。**季羡林先生对他曾有极高的评价：“学富五车，却从无骄矜之气”，是“恂恂如也”，“而我最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”。因为，谦虚是东方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不管时代如何发展，我们都不能遗忘这种美德、丢弃这种美德。

二是睿智。在敝人心中，蔡老是一个专通结合，学问精深，目光深远，练就通达的学者。**其一，通识的历史眼界。**蔡老虽为中外关系史专家，他研究的题目如季羡林先生所讲“多属冷僻一类，别人没有涉足过的”，可谓“专”得没人到，但听其讲课、点评和答问，观其著述，与其谈话，在享受他引经据典，信手拈来，比喻形象，融会贯通，结论独到，耳目一新的过程中，却不能不感到他胸有“通识”的人文素养和历史眼界。**其二，发覆的治学传承。**一代宗师陈寅恪治学的最大特色是发覆，“覆”是掩盖，“发”是发掘，就是善于透过大量看似平常的传世文献，“由表及里”，“以小见大”，“史外寻史”，达至“从史中求史识”的学术气质。不论是以诗证史，还是“著书唯剩颂红妆”，均是陈氏“发覆史学”的经典案例。如今，蔡老师的《俄罗斯馆纪事》、《尼姑潭》、《哈巴狗源流》等著论深受陈氏“发覆史学”的影响，确有陈门之风，继承了发覆的本领和精神，不止于此，他在授业解惑中不遗余力传播发覆的学术风格，推动“发覆史学”生生不息。**其三，通达的人生境界。**蔡老从事历史研究，不仅做到以通识眼光作专题研究，发覆求真，学问精到，而且他胸怀若谷，目光深远，对做人、做学问的思考上升到一种精神境界，文以载道，集中体现在他的《学境》和《学理与方法》这两本书。他将本采访稿的题目改定为“脱俗求真的追随者”，表达的就是精神追求和学术追求的一种境界。

我记得在 2008 年本科教学评估期间，我们向评估专家、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汇报中大文化和中大师德建设情况后，他被我们展示的一张张八九十岁老教授健康犹在、笑容随和的照片所打动，好奇地发问：“中大校园有何神秘？这么多教授为何如此长寿？”我们当时都会心笑了，并伴有自豪感。

今天，我禁不住将此事和蔡老联想起来。是啊！他或他们健康长寿，固然有中大康乐园优美环境和文化底蕴的外在滋润，但依鄙人之见，他本人或他们本人在学术、育人和人生诸方面的悟道修行达到的境界，才是根本所在！

导读

■ 蔡鸿生教授：脱俗求真的追随者　1 版

■ 中大故事·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
1、长怀伟人　笃志厉行
——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风雨历程
2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　实事求是　求真求实
——中大“孙学”研究者的治学品格
3、“立志做大事　不可立志做大官”
——林家有教授谈孙中山与中大精神
4、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大事记
5、孙中山研究室、所历任主任、所长简介
2-3 版

■ ASCO 的中国“好声音”
——肿瘤防治中心林桐榆教授团队获邀在ASCO 大会发言

■ 灵巧的智慧与通达的史识
——评黄天骥教授的《岭南感旧》　4 版